

## 曲阜师范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原创性说明

(在□划“√”)

本人郑重声明：此处所提交的博士□ 硕士论文《“文革”时期曲阜“破四旧”运动述略》，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在曲阜师范大学攻读博士□ 硕士学位期间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论文中除注明部分外不包含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工作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已明确的方式注明。本声明的法律结果将完全由本人承担。

作者签名：

冯娜

日期：2010.6.4

## 曲阜师范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使用授权书

(在□划“√”)

《“文革”时期曲阜“破四旧”运动述略》系本人在曲阜师范大学攻读博士□ 硕士学位期间，在导师指导下完成的博士□ 硕士学位论文。本论文的研究成果归曲阜师范大学所有，本论文的研究内容不得以其他单位的名义发表。本人完全了解曲阜师范大学关于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并向有关部门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本，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曲阜师范大学，可以采用影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可以公开发表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作者签名：

冯娜

日期：2010.6.4

导师签名：

李光印

日期：2010.6.4

## 摘要

“破四旧”运动是发生在“文革”初期的一个特定事件，这场运动首先从北京开始，后在官方舆论宣传工具的鼓惑以及“左”倾思潮的影响下，运动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

“破四旧”运动初期，曲阜县委领导干部顶住压力，援引文物保护条例，把“三孔”与“四旧”区别开来，较好的保护了“三孔”。但是，在以谭厚兰为首的北师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来到曲阜以后，“破四旧”运动脱离了原有轨道，演变成一场“打倒孔家店”、“造孔家店的反”的“讨孔”运动。

曲阜的“破四旧”运动，一方面具有全国“破四旧”运动的共同色彩：如风风火火的改名风潮，将所谓“散发资本主义、封建主义霉味”的村庄名、街道名、地名、商店名、人名等，转换成带有革命色彩的名称；如取消一切庙会，拆除各种牌坊；如对婚丧嫁娶等各种传统的风俗习惯进行改革；如对服务行业和文艺界、宗教的冲击；甚至是乱批斗、抄家之风也如出一辙。另一方面，曲阜的“破四旧”运动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操纵和支持，在其纵容下的以谭厚兰为首的“讨孔”运动成为曲阜“破四旧”运动的重中之重，也成为曲阜“破四旧”运动的特色内容。

仅从表面来看，“破四旧”运动中破除一些陈旧的礼俗习惯、风俗迷信等，是具有社会进步意义的。但是，由于这场运动是为“文化大革命”的开展铺路的，它对于“新”和“旧”的概念没有科学、正确的标准和态度，加之红卫兵政治上不成熟、缺乏社会经验，被林彪、江青一伙利用，致使运动迅速演变成一场砸文物、毁古迹、批斗、抄家等具有强制性的破坏运动。

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升级，四人帮争权夺利斗争的加剧，“破四旧”运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退出了历史舞台。

回顾“破四旧”运动的历史，它非但未能实现“破旧立新”，推动社会的进步，反而给曲阜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造成了社会的动荡和历史的倒退，个中经验值得深思。

**关键词：**“文化大革命”；曲阜；“破四旧”；红卫兵

## Abstract

The "Destroy the Four Olds" campaign is a particular event happen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t first began in Beijing, and then under the agitation of the official media propaganda tool and the influence of "Leftist thought", this campaign quickly spreade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Destroy the Four Olds" campaign, the cadres in Qufu county committee resisted the pressure, by invoking the rules on protection of cultural relics, they distinguished "San Kong" with "Four Olds". Thus they effectively protected "San Kong". However, after the coming of the Mao Zedong Thought Red Guards Jinggang Mountain Fighter Group, headed by Tan Houlan from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the "Destroy the Four Olds" campaign got out of the original orbit. And this campaign turned into a campaign which crusaded against, downed with, and rebelled Confucianism.

On the one hand, the "Destroy the Four Olds" campaign in Qufu had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national "Destroy the Four Olds" campaign. Some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were as follows: renaming in a blustering wave, i.e. changing the village names, street names, place names, store names, person names which were with so-called capitalist and feudalist characteristic to some names with revolutionary color; cancelling all temple fairs and dismantling various archways; reforming the traditional wedding and funeral customs; persecuting and confiscating the property. Even the influences of this campaign to service sector, cultural field and religion were exactly the same. On the other hand, the "Destroy the Four Olds" campaign in Qufu was manipulated and supported by the central cultural revolution group. Under the indulgence of this group, the crusading against Confucianism campaign, headed by Tan Houlan, became the priority and the particular content of the "Destroy the Four Olds" campaign in Qufu.

Looking at it superficially, some old customs, old habits and superstitions were eradicated in the "Destroy the Four Olds" campaign, which represented the progress of the society. However, this campaign actually paved the way fo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at's more, it had no scientific or correct standard and attitude to the concepts of "new" and "old". In addition, the Red Guards were politically immature and lacked of social experience, thus they were used by Lin Biao, Jiang Qing and their like. As a result, this campaign quickly turned into a destructive movement to repressively break cultural relics, destroy historic spots, persecute and confiscate the property.

With the upgrading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waxing of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money in the Gang of Four, the "Destroy the Four Olds" campaign gradually

faded out of people's vision and retreated from the stage of history.

Reviewing the history of the "Destroy the Four Olds" campaign, neither it destroyed the old and established the new, nor it promoted the progress of the society. In the opposite, it brought huge negative impacts to various fields in Qufu, such as political life, economic life, cultural life, educational life, social life and so on. It caused the unrest of society and retrogression of history. The lessons of it are worth pondering over.

**Key word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Qufu, the "Destroy the Four Olds" campaign, the Red Guards

# 目 录

绪论	1
一、曲阜“破四旧”运动的背景	2
1、曲阜“文化大革命”的开场	2
2、红卫兵组织的出现	3
3、曲阜“破四旧”运动的开场	4
二、曲阜“破四旧”运动的开展过程	5
1、曲阜“破四旧”运动的初步开展	5
2、“破四旧”运动中的“讨孔”运动	6
(1)“讨孔”运动的开场及“挫折”	6
(2)“讨孔”运动的再起与孔府劫难	8
(3)“讨孔”运动的余波	11
(4)“讨孔”运动中红卫兵、县委和百姓的心理状态分析	12
3、曲阜“破四旧”运动的内容	14
1、风风火火的改名风潮	14
2、取消一切庙会、拆除各种牌坊	15
3、婚丧嫁娶等习俗的改革	16
(1)婚姻问题上的“破旧立新”	16
(2)丧葬礼仪与祭祖的变化	17
4、传统节日习俗的改革	17
5、批判服务行业的“歪风”	18
6、文艺方面的“破旧立新”	19
7、批斗和抄家	20
8、其他	21
(1)取缔一切“牛鬼蛇神”	21
(2)对宗教的冲击	21
4、曲阜“破四旧”运动的影响及评价	21
1、影响	22
(1)对文物的破坏	22
(2)对曲阜教育事业的阻碍	22
(3)对曲阜经济的影响	23
(4)对人们正常生活的干扰	24
2、评价	24
结 语	26

参考文献.....	27
在校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30
致 谢.....	31

# “文革”时期曲阜“破四旧”运动述略

## 绪论

“破四旧”运动是发生在“文革”初期的一场破坏性群众运动。这场政治灾难曾经强烈的震撼了整个中国，造成了社会的动荡和历史的倒退，个中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因此，近年来学术界对于这场运动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

相关论文有十几篇，其中：武立贵的《回忆破四旧》、何立波的《破四旧风潮的前前后后》、《文革初期的破四旧风潮》、《荒诞的破四旧》、李云的《破四旧》等，从全国的大背景下对这场运动做了简单的描述；何立波的《破四旧狂潮与文物浩劫》、王革新的《杭州灵隐寺缘何免遭破四旧一劫》描述了“破四旧”运动过程中文物的破坏与保护；叶青的《文革时期福建红卫兵破四旧运动述略》与孟红的《文革初期山西的破四旧运动》，具体描述了当地“破四旧”运动开展的背景、过程、内容，以及对这场运动造成的影响进行了简单的分析；金春明的《破四旧、立四新的历史反思》一文从运动的指导思想、理论依据等方面进行了解剖和分析，并从理论上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

另外，在一些通论性的专著中也涉及到“破四旧”运动的内容，主要有：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郑谦的《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稿》、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谭宗极、席宣的《“文化大革命”简史》、邸延生的《历史的真知》、郑谦、张化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第三卷）》、师东兵的《文革十年史（1966-1976）》、严家琪、高皋编著的《中国文革十年史》（全二册）等，书中关于“破四旧”运动一节的描述，几乎全是简单历史事实的叙述，评价也不深入。目前也尚未发现有专门整理“破四旧”运动的文献。

检视过去已发表的成果，笔者认为存在诸多不足，举其要者：第一，对于“破四旧”运动的研究，大多是全国性宏观概况的描述，以及一些回忆性质的文章，内容简单，评价也不深入；第二，以往研究主要侧重于从历史学、政治学的角度对运动的背景、内容、影响等进行描述，缺乏从社会学、心理学角度对当时人们心理状态的分析；第三，虽然出现了一些地域性、基层性的研究，但也只是泛泛而谈，缺乏深刻的分析；第四，虽然有的论文和著作利用档案材料进行写作，但这也只是凤毛麟角。

鉴于此，我的导师敏锐的观察到上述不足，并建议我以曲阜为例，首先，具有地域优势，既可以利用曲阜档案管保存的相关档案资料，保证文章内容的真实性，也方便利用课余时间进行田野调查，深入了解当时人们的心理状态。这样，本文写作既具有历史学的严谨，也具有社会学、心理学的理性；其次，曲阜的“破四旧”运动因为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成为全国“破四旧”运动的重灾区 and 风向标，通过曲阜“破四旧”运动的微观研究可以透视全国“破四旧”运动的宏观概况；另外，作为孔子的故乡，“打倒孔家店”的“讨孔”运动成为曲阜“破四旧”运动的重中之重，这也使我们研究曲阜

“破四旧”运动有了重点和特色之处。因此，在导师的指导下，最终将“‘文革’时期曲阜‘破四旧’运动”作为我的毕业论文选题。

围绕着这一选题，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理论导向，运用历史文献研究、田野调查的方法，吸收社会学、心理学的观点，对曲阜的“破四旧”运动进行介绍和探讨。在研究资料的搜集上，笔者在导师的带领下，查阅了曲阜市档案馆保存的有关“破四旧”运动的档案资料、“文革”期间的报刊杂志以及曲阜地方志等资料，走访了“破四旧”运动的一些亲历者，从他们身上收集了一些弥足珍贵的“活史料”。

在研究方法与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本文的具体思路如下：第一部分首先介绍曲阜“破四旧”运动发生的背景，理清运动的来龙去脉。第二部分对曲阜“破四旧”运动开展之初的情况进行梳理，并在此部分中对“讨孔”运动做了详细描述。第三部分具体介绍曲阜“破四旧”运动的主要内容，使人们对这场运动有了全面认识。最后第四部分对曲阜“破四旧”运动造成的影响进行总结与分析。

## 一、曲阜“破四旧”运动的背景

“破四旧”运动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和红卫兵的出现蔓延开来的，在曲阜同样如此。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早在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完全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我国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正确估计，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阶级斗争上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错误论断愈演愈烈，尤其是1965年1月，在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把我国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断言为建国以后几十年来我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把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党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发展成为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毛泽东就把注意力和斗争矛头越来越集中到党内和党的领导机关，为他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的发表及随之而来的在文艺学术领域里的批判运动，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及这两个会议相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是全国“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的标志。

### 1、曲阜“文化大革命”的开场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中共山东省委召开了二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会

议做出了《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决心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放手发动群众，在省、地（市）、县（市、区）委、省级有关部门、大专院校等建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负责文化革命的具体领导工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sup>[1]</sup>。这标志着中共山东省委开始全面接受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方针。

根据这次会议精神，6月13日，中共曲阜县委召开常委会议，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中共山东省委二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做出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決定，研究曲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会议決定成立曲阜县“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小组下设办公室，首先在文化教育界，主要是各学校展开文化革命。18日，中共曲阜县委鉴于本县学校出现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的混乱现象，根据曲阜师范等学校学生的要求，从县直部门抽调50多人，组成3个工作组，进驻曲阜师范学校、曲阜一中、曲阜二中，加强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

7月初，根据《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连续发表的社论精神，针对曲阜已经出现的“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实际情況，中共曲阜县委做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決定》指出：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就是要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決定》并对曲阜县将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做了具体安排，这标志着曲阜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始<sup>[2]</sup>。

## 2、红卫兵组织的出现

红卫兵组织最早发源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的十几名学生聚集在圆明园旧址，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意思为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他们的誓言充满了豪言壮语：“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sup>[3]</sup>他们积极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充当“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在学校内张贴大字报，批判学校领导、教师和教育制度。

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回信，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并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同时，毛泽东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sup>[4]</sup>

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很快将毛泽东的这封信公诸于众，在此形势下，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起来。

这期间，曲阜师范学院、曲阜师范学校、曲阜一中等各个学校的学生亦相继建立了以“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红色造反团”、“红色敢死队”、“战酣酣兵团”、“造

反轻骑”、“山鹰战斗组”、“红心战斗队”、“白求恩战斗队”、“多奇志战斗队”、“爆破队”、“奋起战斗兵团”、“反修兵团”、“红前哨”、“代代红”、“无畏”等各种名称的红卫兵组织，各机关、厂矿单位和村社也相继建立了红卫兵组织。1966年8月18日、31日和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时，曲阜部分赴京师生和红卫兵也受到接见，这极大调动了曲阜红卫兵的积极性，将曲阜红卫兵运动推向高潮。

### 3、曲阜“破四旧”运动的开场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炮制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横扫一切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的牛鬼蛇神……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对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切遗产、风俗、习惯都必须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加以透彻的批判”<sup>[6]</sup>，这是“破四旧”的首次提出，并为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所肯定：“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sup>[6]</sup>

8月18日，天安门广场召开“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林彪在接见大会上为“破四旧”做了煽动性号召：“要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林彪在讲话中还号召：“我们坚决地支持你们敢打、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要在毛主席领导下，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旧风俗、旧习惯势力展开猛烈地进攻！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sup>[7]</sup>

红卫兵似乎一下子找到了显示他们力量的最好方式，以急不可待的心情走上街头，开始所谓的“破四旧”运动，他们到处张贴《向旧世界宣战》等所谓大字报、传单、标语，到处集会演说，对不合“无产阶级”口味的发式、服装、装饰等进行攻击；对中外古典名著、字画、遗址等进行焚烧和捣毁；对街道、店铺、学校等进行更名活动；对他们认定是“阶级敌人”的各界领导干部、教授学者和党员、教师、劳模等进行批斗和抄家……对于这样一些人类正常思维难以想象、人类正常理智难以接受的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粗暴行为，《人民日报》却对此进行了连续、正面的歌颂性报道：“我们为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红卫兵小将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这是振奋人心的大事，这是大快人心的喜事……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sup>[8]</sup>8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

了毛主席语录“造反有理”，这样，“破四旧”运动就从北京蔓延到全国各城市。8月25日，《人民日报》登载了《上海、天津革命小将和商业职工向剥削阶级“四旧”发动总攻》的报道，26日又发表《各地小将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总攻击》的报道，27日又报道了《横扫“四旧”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各城市》的信息。就这样，在领导人物的默许下，加上别有用心之辈的怂恿，以及舆论工具的推波助澜，“破四旧”运动的洪流迅速涌向全国。

中共曲阜县委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精神指示下，领导各县直单位和各人民公社组织宣传队，进行广泛的宣传活动。曲阜师范学院、曲阜师范学校、曲阜一中等学校的红卫兵和城关公社广大贫下中农也走上街头张贴大字报、大标语，要求立即开展“破旧立新”运动。8月23日，中共曲阜县委做出了开展“破旧立新”运动的决议。决议指出：搬掉节孝坊；拆除神庙、神楼；改革婚丧嫁娶的旧习俗；取消一切庙会、香火会；更改旧街名等等<sup>[9]</sup>。9月5日至14日，曲阜县贫下中农协会第一届委员会第三次代表会议召开，大会对如何开展“破四旧”运动做了简单的安排：

1、将带有封建迷信、资本主义毒素的村庄名、街道名、地名、商店名等等，改为富有革命意义的新名称。新名称的命名，农村的，要由贫下中农民主决定；工厂、商店的，要由革命职工民主决定。

2、从今年旧历十月一日起，取消宣传尊孔复古的林门会，取消一切庙会、香火会，从现在起，统统取消。

3、改革婚丧嫁娶的旧习俗。

4、取缔神汉、神婆、相面的、算卦的、看风水的，等等一切牛鬼蛇神。

5、拆除节孝坊、功德碑、神像、神楼，等等。

6、服装行业坚决不做奇装异服，不理怪发。

7、严禁赌博。

8、严禁制造、贩运、出售迷信品<sup>[10]</sup>。

从此，全县开始了一场“破四旧、立四新”的群众运动。

## 二、曲阜“破四旧”运动的开展过程

### 1、曲阜“破四旧”运动的初步开展

在北京红卫兵8月20日之后走上社会大破“四旧”的榜样昭示下，曲阜师范学院红卫兵与曲阜各学校红卫兵一起，也走出学校大破“四旧”，向旧街名、旧书刊书画，向每家每户的家谱、祖宗牌位，向窗户上的雕花，箱柜上的人物花鸟、墙上的花鸟鱼虫字画，向姑娘的长辫子、老太太的纂儿发起了进攻。许多人家不等红卫兵去破，就主动把家里的书籍、文玩、家谱等一烧了事，或者用地排车拉着送往废品收购站<sup>[11]</sup>。

8月24日，城关镇人民公社更改了全城所有旧街名，换上了富有革命意义的新街

名。各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各公社及生产队在县委领导组织下，开始了对“四旧”物品的全面清剿。各公社由负责宣传文教的干部、派出所民警及有关人员组织“破四旧”小组，到各村、队发动、监督<sup>[12]</sup>。于是，“破四旧”运动像一场飓风一样在曲阜刮了起来。

按照北京的经验，首当其冲的是黑五类分子家庭，民兵和红卫兵们闯进他们的家里，翻箱倒柜搜查，将搜出来的书籍、画报、古玩、装饰、衣服等全部装上地排车，拉到大队部去，然后上缴到公社，最后再把全村的黑五类分子集合起来游街，让他们戴上高帽子，一边走一边自报家门：我是地主分子×××，我是右派分子×××。被毛主席从苦海里解放出来的贫下中农家中的“四旧”则由他们自己清查上缴。在曲阜，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无论是富裕还是贫穷，几乎每家每户都会在堂屋里挂上一副中堂，有《寿星图》、《五子登科》、《麻姑献寿》、《松鹤延年》、《岁寒三友》、《八仙过海》、《连年有余》等，中堂两边挂上对联；很多人家里的条几上还摆有不知道哪一辈传下来的古色古香的花瓶，或者是一柄如意，或者是一方古砚……农民们舍不得将这些东西交出去，便尽量收藏起来，只把一些很粗糙的字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朱子家训》、《增广贤文》、《封神演义》、《连环画》以及扑克、象棋之类的东西交出去，最后这些所谓“四旧”物品被投进该公社、大队燃起的“破四旧”的大火之中，农民们则围着熊熊火焰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彻底砸烂旧世界！”“破四旧！立四新！”<sup>[13]</sup>。

曲阜县城各大队“破四旧”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多彩。各公社的共青团员、民兵在原团支部书记、民兵连长的带领下，把曲阜城中的牌坊都当做“四旧”拉倒了。“由于上级规定，哪个队拉的，石料归哪个队所有，这样一来，大家的积极性更高了，只几天功夫，十几座牌坊就全被拉倒了。”<sup>[14]</sup>拉完了牌坊，人们的目光又对准了那些老房子屋脊上用来辟邪的装饰物：叭叭狗、狮子、龙、鸟、鱼、雄鸡等土陶塑像，于是，这些过去一直活灵活现的蹲在屋脊上的动物都被一扫而光……

所有这一切，都是“破四旧”运动的最初内容，伴随着这些而来的是轰轰烈烈的“讨孔”运动。

## 2、“破四旧”运动中的“讨孔”运动<sup>①</sup>

“讨孔”运动是在“破四旧”运动中酝酿和引发的，是曲阜“破四旧”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曲阜“破四旧”运动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儒家思想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孔子成了中国传统旧思想、旧文化的代名词，因此，在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破四旧”运动中，“讨孔”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 (1)“讨孔”运动的开场及“挫折”

“破四旧”运动在曲阜开始后，曲阜师范学院等学校红卫兵迅速走出学校大破“四

<sup>①</sup>本部分根据《中国共产党曲阜市历史大事记》、《讨孔战报》以及社会调查整理而成

旧”，在他们看来，儒家学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几千年来，封建皇室正是依靠儒家说教控制人们的思想，维系自己的正统地位，因此，它是需要破除的旧思想、旧文化。孔子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者，更是需要批判，“三孔”也被他们视为封建主义“四旧”的老根子。“三孔”包括孔府、孔庙、孔林，1961年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此情况下，曲阜县委研究决定加强文物管理委员会的领导，既要制止曲阜各学校红卫兵破坏“三孔”，又要防止后院起火。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虽然孔老是封建主义的代表，但是‘三孔’是国家财产，他们保护的是‘三孔’，是国家文物，一旦破坏了，便永远也不能恢复。”<sup>[16]</sup>最后，在县委的保护下，在国务院“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权威下，各个学校的红卫兵并没有采取过激行为。

威胁来自外地串联的红卫兵。8月23日晚，县委接到泰安水校的红卫兵及一些外地串联的学生要来曲阜破“四旧”、砸孔府孔庙的通知，县委书记李秀立即召开县委常委会议研究对策，并邀请曲阜师范学院派红卫兵来参加会议。会后，县委安排曲阜一中、曲阜师范学校的红卫兵连夜写贴大字报、大标语，大字报、大标语既要有批判孔子的封建主义的内容，又要有按照国家规定保护文物的内容。第二天上午大字报贴满了孔府招待所，这对于保护“三孔”起到了舆论宣传作用。泰安水校红卫兵到达曲阜后，县委在接待会上对于是否保护“三孔”文物的问题与他们展开激烈辩论，强调破坏“三孔”就是破坏国家财产，就是否定国务院树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权威，在县委的正言辟下，泰安水校的红卫兵终于答应不破坏“三孔”。

但此时，曲阜师范学院红卫兵的“热情”高涨起来，8月25日上午，他们排着长队，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唱着毛主席语录歌，高呼“打倒孔老二”、“彻底捣毁孔家店”的口号，涌向孔府门前，并将“讨孔”大字标语贴满大街小巷，向群众发表演讲，号召人们起来造“孔家店”的反，为在曲阜开展“讨孔”运动大造舆论。文管会工作人员与他们展开辩论，强调孔府是国家财产，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这里搞破坏是触犯国家法律的，在法律的威严下，红卫兵无言以对，怏怏而去。

面对曲阜本地红卫兵既要发动起来大规模“讨孔”的形势，8月26日，县委书记李秀代表县委向曲阜师范学院红卫兵介绍了曲阜县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根据《国务院文物保护单位条例》把曲阜的孔庙、孔府、孔林和鲁国故城遗址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现实，劝说红卫兵不要火烧孔庙、孔府、孔林，留下来改造成阶级教育展览馆。但是，当日晚，曲阜师范学院红卫兵聚集在孔府门口，高呼反孔口号，仍然声称要火烧孔府、孔庙。曲阜县城关人民公社的干部、群众在县委的安排下，出于保护文物的心情到孔府门口劝阻，与红卫兵发生争执，红卫兵认为这是曲阜县文管会“唆使”而致。于是大闹县委，直至逼着县委罢了分管文物工作的副县长王化田的官，才算了事。“八·二六”事件之后，孔府、孔庙暂时平静下来。

县委、县文管会的领导利用这短暂的平静抓紧对“三孔”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将孔

府大门两侧的石狮子用毛主席语录板遮盖起来，希望在最高指示的保护下，能够万无一失；将在孔庙东路诗礼堂举办的曲阜县农业展览搬到孔庙，将大成殿里的孔子及四配、十二哲的塑像遮盖起来……在曲阜当地干部、群众的保护下，“讨孔”运动并没有顺利开展起来，直至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来到曲阜之后，“讨孔”运动才渐渐进入高潮。

## （2）“讨孔”运动的再起与孔府劫难

在小城曲阜仍然沉浸在“八·二六”事件之后的静寂之中时，北京已经开始酝酿一场“讨孔”运动的阴谋。“讨孔”运动的高潮就是以谭厚兰为首的北师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来到曲阜之后掀起的。

### ①北师大红卫兵的到来及舆论宣传

1966年10月底，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红旗》杂志负责人林杰指使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因为孔子是“万世师表”，因此，打倒“孔家店”的使命理应由未来的教师们来完成。

11月7日，谭厚兰率领其领导下的北师大红卫兵二百多人，在天安门纪念碑前宣誓：“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是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小兵！……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哪里反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在哪里造反！……‘孔家店’，是反动的儒家学说的渊源！‘孔家店’是封建主义的象征，是‘四旧’势力的代表！‘孔家店’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进行反革命复辟的支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招魂店’！我们坚决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把‘孔家店’彻底捣毁，砸他个稀巴烂！‘粪土当年万户侯’，我们坚决要把孔‘素王’拉下马来！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sup>[16]</sup>并派几个红卫兵先行到曲阜传达“讨孔”消息。

县委接到北师大红卫兵要来曲阜“讨孔”的通知，马上给驻城各机关、厂矿、企业单位领导做了布置，严格规定“不许与红卫兵接触，不与他们辩论，不给他们传递消息，不参加他们的一切活动，哪个单位出了问题，哪个单位的领导就要负责。”<sup>[17]</sup>县委打算通过这种消极抵抗的办法与北师大红卫兵抗争，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

9日，北师大红卫兵来到曲阜，不顾省委、县委和孔庙管理处的劝阻，串联当地一些造反派，与曲师院等院校的红卫兵联合成立了“讨孔联络站”，并在曲阜师范学院创办了《讨孔战报》，为“打倒孔家店”大造舆论之势。他们在《讨孔战报》发刊词中写到：“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是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腐蚀剂，是反革命复辟的舆论基础，是毛泽东思想的死对头！不破不立。要大立四新，竖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就必须大破‘四旧’，与反动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斩草要除根，擒贼先擒王。‘四旧’的根子在哪里？反动的传统观念的罪魁祸首是谁？根子在孔家店！罪魁祸首就是孔老二！孔家店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老巢，孔老二是反动透顶的‘儒家学说’的鼻祖！本报将彻底的揭露和批判孔家店的滔天罪行，不把它们批倒批臭，决不罢休！”<sup>[18]</sup>《讨孔战报》编辑

部成员还自编自谱了《捣毁孔家店》的战歌，“孔家店，阎王殿，血债累累，罪恶滔天！文化革命战鼓响，孔家店的末日在今天！捣毁孔家店！砸烂孔家店！向四旧势力齐开战，齐开战！孔老二，大坏蛋，反动透顶阴魂不散。毛泽东思想红旗飘，孔老二的末日在眼前！打倒孔老二！火烧孔老二！向四旧势力齐开战，齐开战！”<sup>[19]</sup>这首通俗易懂又有旋律的“讨孔”战歌在当时将“讨孔”运动深入民心起到了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

与此同时，红卫兵还到处散发《火烧孔家店——讨孔檄文》、《告全国人民书》等传单，在县委门口、孔府门前的大街上贴满大标语，并扬言要“彻底捣毁‘孔家店’，火烧孔相，刨平孔坟，揪出尊孔、祭孔的反动学术‘权威’游街示众！让那些资产阶级的‘老爷’们在我们的背后唧唧喳喳吧！让那些‘白脸土匪’去给我们横加种种罪名吧！‘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造孔家店的反是造定了！一反到底，彻底捣毁！不获全胜，决不收兵！”<sup>[20]</sup>红卫兵这种坚决的“讨孔”态度使得他们在日后的“讨孔”运动中变得狂热而冲动。

他们最先来到孔府，参观中他们翻出了国民党党旗、党徽，蒋介石的照片和“训词”，袁世凯颁发给孔氏的勋章、执照，满洲国国旗，以及孔府与袁世凯、汪精卫等人的照片和函件等，这些都成为“讨孔”运动迅速展开的突破口，也助长了“讨孔”的声势。他们“乘胜追击”，闯进了设在孔府西院的国际旅行社，在那里，他们看到了手工编织的地毯、沙发、席梦思床、毛毯、白瓷浴缸等，如此高档、奢侈的生活用品自然引起了红卫兵的不满，于是，他们便将几双沙发和席梦思床抬到院子里展览，并贴上“资产阶级的安乐窝”、“封、资、修的三合店”等大标语，鼓动旅行社的服务员起来造国际旅行社的反。

此外，红卫兵展开广泛宣传，到处发表演讲，控诉孔家店剥削劳动人民的罪恶，号召人们起来“讨孔”，并且将在孔府里翻出来的“四旧”物品搬出来，举办了“孔府罪恶史展览”，号召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参观。当孔府里奢侈的生活用品，后花园、假山、花房，尤其是那些地契、国民党党旗、东洋刀以及衍圣公与官僚政客的合影照片展现在眼前时，人们震惊了。展览取得了应有的效果：在认识孔家店的罪恶、在“讨孔”问题上红卫兵与曲阜群众产生了共鸣。在参观后召开的“讨孔”座谈会上，贫下中农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看到这些气得俺直打哆嗦，这不是阶级敌人在搞复辟吗？”

“他们这是想变天，想叫我们贫下中农受二茬子罪，想叫我们贫下中农人头落地！”

“我们建议把‘孔府’里窝藏着的那些见不得太阳的东西全部展出来，这些反面教材，让全县、全国的贫下中农和红卫兵都受教育；最好也把它们拿到农村去办流动展览，让不能来‘孔府’的人也见识见识‘孔府’这个大黑店。”<sup>[21]</sup>

不管是看到这些所谓“四旧”物品与自己的生活状况存在天壤之别有感而发，还是适合当时形势需要畅所欲言，总之，这些都说明红卫兵的“讨孔”运动在群众中有了思想基础，广大贫下中农将要被发动起来了。

此时，县委则感到沉重的压力：孔府里用来求神拜佛的神像、铜佛、泥塑、以及衍圣公与军阀官僚、日本人的合影照片都可以划为“四旧”，被破坏了不仅是文物的损失，而且县委还要承担包庇“四旧”的罪名。于是，县委又开始采取措施以减小压力，经过讨论，他们决定悄悄将国家一级文物“商周十供”及一些佛像、珍贵文物珍藏起来，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尽量保护文物，减少损失；将记载着孔府社会关系的照片、函件统统烧掉，毁灭“讨孔”的“证据”……但最终无济于事，这些东西后来都被红卫兵翻了出来，县委真的戴上了包庇“四旧”的帽子。

凭借自己的力量不能阻止“讨孔”运动带来的文物破坏，县委开始向上级寻求帮助。12月11日上午，县委办公室向国务院报告了北师大红卫兵要火烧孔庙、孔府的消息，第二天他们便收到了陈伯达的指示：孔庙、孔府、孔林不要烧掉，孔坟可以挖掉<sup>[22]</sup>。这个指示没有让曲阜县委如愿以偿，反而开始从固守的阵地上撤退。他们想要保护“三孔”，保护国家的文物古迹不受破坏，履行作为地方父母官的责任，又要服从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顺应“文化大革命”的潮流，高举批判“孔家店”的大旗，即使对红卫兵的造反行动感到反感，也要向红卫兵表示支持“讨孔”，他们处于矛盾之中，也处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境地。

## ②“彻底捣毁孔家店誓师大会”的召开

11月15日，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曲阜师范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曲阜部分中小学红卫兵及来曲阜串联的全各地的红卫兵2000余人，在孔府门前举行“彻底捣毁孔家店誓师大会”，宣读《讨孔檄文》，污蔑国务院1961年为孔庙、孔府、孔林和鲁国故城遗址竖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认为：“是这个‘重点保护’，使孔老二的推崇者越发肆无忌惮的放毒！是这个‘重点保护’，使孔府、孔庙的枯木朽株、污泥浊水成了宝贝！是这个‘重点保护’，给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大立毛泽东思想设下了重重障碍！这个‘重点保护’，有百害而无一利。是可忍，孰不可忍？！……把‘孔家店’当做‘重点文物’加以保护，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毛主席说：‘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因此，所谓文物，也只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sup>[23]</sup>红卫兵还在大会上庄严宣誓：“火烧孔老二，刨平孔丘坟，捣毁孔家店，彻底造孔家店的反！打掉一切牛鬼蛇神的保护伞，砸烂障碍革命的保皇碑！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可挨打，可挨斗，不可低下革命的头！彻底砸烂旧世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永远跟着毛主席，大风大浪干革命！‘借问瘟君欲何往’，让这块保皇碑见鬼去吧！”<sup>[24]</sup>会后，他们砸碎了孔府门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

之后，他们冲进孔庙，直奔大成殿，将殿中明代弘治年间雕塑的孔子像、四配（颜

渊、曾子、子思、孟子）神龛、清朝康熙帝题字的“大成至圣先师”匾额、大成殿两旁孔子弟子和历代宣扬儒学的著名人物共155人的牌位拉倒和砸毁了。随后，他们又将周公庙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拉倒，将“棂星门”门顶上坐着的四尊罗汉砸碎，周公泥像和神龛也被拉倒在地。下午，他们又将孔林门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砸碎，将门前两尊石狮推倒在地，孔林前门高大的牌楼上嵌着的“至圣林”三个字也被破坏。

### ③万人大会的召开及会后游行

为了将“讨孔”运动继续深入下去，11月28、29日连续两天，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曲阜师范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指挥部联合曲阜部分中等学校红卫兵，在曲阜师范学院大操场召开包括工人、农民和各地来曲阜串联的红卫兵约10万人参加的“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即万人大会），大会由谭厚兰主持。会上，工人代表、贫下中农代表、红卫兵及革命师生代表分别“控诉了孔家店的罪恶，批判了孔老二的统治人民两千多年的反动理论，戳穿了孔老二‘仁义道德’、‘礼义廉耻’及所谓‘仁政’思想的画皮，揭露了孔府抢地占田、杀人害命、勾结反动派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反动本质。”<sup>[25]</sup>大会还批斗了山东省分管文化教育的副省长余修、省委宣传部部长王众音、曲阜师范学院教务长高赞非、教授王先进和历史学家严北溟、周予同等人。会后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游行示威，将余修等人和大成殿推倒的孔子塑像、大成殿牌匾一起架上汽车游街示众。数里长的游行队伍从曲阜师院出发，穿过孔庙、孔府，直到孔林西南角，将孔子塑像、大成殿牌匾以及古代字画纵火焚烧。

召开万人大会的同时，在中央文革“孔坟可以挖掉”的指示下，由红卫兵和贫下中农组成的突击队在孔林掀起了掘墓狂潮。孔子及其后裔的坟墓被掘开，“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碎，孔林明代以后的碑几乎全被拉倒，他们要把“孔林里的东西，能修桥的拿去修桥，该用在建筑工业上的就拿去建设，把孔林变成园林，把死林变成活林”<sup>[26]</sup>。如“孔林西边夏家村小公社驻地的大礼堂就是用石碑垛起来的，各村的氨水池和仓库也是石碑建起来的，后来公社取消之后，礼堂、仓库被扒，部分石碑又被村民用来建造了房屋”<sup>[27]</sup>。著名古文献专家周予同教授因为参加1962年的孔子讨论会，被从他工作的上海复旦大学千里迢迢解押到曲阜，逼着亲手挖孔子的坟墓。

会后红卫兵向毛泽东发去“致敬电”，“汇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被我们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被我们摘了下来。‘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我们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偶像被我们捣毁了！”红卫兵们高兴地欢呼“孔林解放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获得新生了！”<sup>[28]</sup>

### （3）“讨孔”运动的余波

1966年12月3日，谭厚兰接到关于北京出现了一股反对关锋、戚本禹逆流的通知，6日便班师回京了。他们走后，“讨孔”任务便落在了以曲师院红卫兵为首的曲阜当地

红卫兵身上。

他们首先组织曲阜县各农村大队贫协主席、贫下中农代表、部分大队支部书记在孔府召开座谈会，总结“孔府罪恶史展览”的效果，并讨论举办一个“阶级教育展览”，以将“讨孔”运动继续深入下去，由此成立了由县委文革办公室、文管会、省博物馆专家和红卫兵四方代表参加的文物判决组，清点孔府库房中所有文物，鉴别哪些是应该留下来的文物，哪些是需要展览或是应该破除的“四旧”。但实际上，在具体清点过程中，仍然是按照红卫兵的标准来判断，很多珍贵的文物由此被划入破除的行列而遭到破坏。

在召开万人大会时掀起的掘墓狂潮中，他们曾经扒出了金银财宝等许多陪葬品，仅在孔令怡坟中，就“刨出黄金六百三十克，碎银七百五十克，银元宝一千克，玛瑙玉器等贵重物品八十四件之多。”<sup>[29]</sup>此时，在利益的驱使下，曲阜县广大贫下中农在生产队的领导下，开始了新一轮的扒坟狂潮。1967年初的一个多月中，这种欲望使人们冲动、发狂，因为“扒坟能够发财”。当时最响亮的一个口号就是“一夜扒个拖拉机”，这体现了一种集体主义精神，也反映了人们希望通过扒坟致富的热情。县委此时已被夺了权，处于瘫痪状态，各公社负责人到孔林劝阻扒坟，但是在发财致富的狂热下，没人能够冷静下来。“讨孔联络站”一方面发出通告制止扒坟，一方面派人到孔林劝阻扒坟，但农民也根本不理睬这些戴着红袖章的孩子们。这次扒坟狂潮使孔林里的地下财产遭到了严重的洗劫。

1968年8月上旬，曲阜县革命委员会和曲阜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改革三孔办公室筹备小组”，在时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的指导下，制订了《改革三孔草案》，计划把孔庙前半部分全部拆除，建立“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后半部分则要搞成一个建国以来反孔与尊孔的两条路线斗争展览；孔府将改造成为收租院式的大型阶级教育展览馆；孔林计划改造成为园艺农场。10月，曲师院就此成立了“开发孔林领导小组”。

在曲阜师范学院“开发孔林领导小组”制定开荒计划的同时，“改革三孔办公室筹备小组”也在筹备一个大型的孔府反动实物展览。1968年12月展览在孔庙大成殿和东西庑举办，红卫兵贴出海报，呼吁广大群众参展。展览共历时五个月，孔府又一次经历了1966年11月那种人山人海的局面，又一次给“三孔”文物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浩劫。

在整个“讨孔”运动中，他们捣毁孔府大成殿中孔子等大型塑像17座，砸烂孔庙大型匾额20多块，烧掉古代册籍2000余册，破坏古代珍贵画像58轴<sup>[30]</sup>，砸毁孔林孔子墓碑等碑石2000余块，在孔林开荒200多亩，伐树500多棵，平坟1000多座，对曲阜“三孔”及宝贵文物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 （4）“讨孔”运动中红卫兵、县委和百姓的心理状态分析

“文化大革命”初期曲阜的“讨孔”运动中，红卫兵是主力军，“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的草绿色军装加上“红卫兵”的红袖章，让他们觉得自己威风凛凛，尤其是他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在天安门几次接见红卫兵之后，他们的革命热

情更是日益高涨，觉得自己是时代的主人，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都应由他们去破除。他们的内心是狂热的，但是在对孔子和“孔家店”的认识上却是非常单纯、非常肤浅的：他们认为“孔家店是封建主义的基础，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墙角，是修正主义的根子，是一切剥削阶级、四旧势力的代表”，而孔子是“孔家店的祖师爷”，因此，“孔家店”和孔子是一个概念，打倒“孔家店”就是打倒孔子，即他们口中的“孔老二”，“孔府、孔庙、孔林是传播封建主义毒素的老巢”<sup>[31]</sup>，是现实生活中最能代表“孔家店”的标志性建筑，因此，“讨孔”也变成了对“三孔”的破坏。

对毛主席的盲目崇拜，对传统文化理解的偏差，对时代赋予他们权利的过度自信，加上他们缺乏政治经验，最终导致了他们被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或间接的操纵和利用，才会在大破“四旧”的浪潮中，来到曲阜造“孔家店”的反，打乱了曲阜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也给曲阜的文物古迹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但是，他们毕竟只是年纪尚轻的学生，政治上不成熟，缺乏社会经验，他们所作出的种种愚昧行为都是由当时的政治环境所误导，他们都是“左”倾错误思想路线的受害者。

在“讨孔”运动中，县委作为曲阜最高领导机关，对于保护“三孔”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尤其是在“八·二六事件”之前，对泰安水校来串联的红卫兵和曲阜当地红卫兵的“讨孔”行为是做了积极抵制的，并取得了成效。县委是有责任保护“三孔”及“三孔”文物的，1961年，国务院将“三孔”划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孔”的重要性和价值不可估量，本着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的使命，县委也要保护好“三孔”文物。但随着“讨孔”运动的开展，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的北师大红卫兵来到曲阜“讨孔”后，县委渐渐控制不住局面，县委领导也开始处于矛盾之中：“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对毛主席没有怀疑，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的一切，但“文革”怎么变成了破坏文物？他们对运动的方式不理解，因此，也变成了对“文革”的不理解；但在红卫兵面前，即使对他们的“讨孔”行为表示反感，表面上也要热情欢迎，因为不支持“文革”就是对毛主席持否定态度。因此在保护文物与支持“讨孔”之间，县委扮演着尴尬的角色。

在“讨孔”运动之初，曲阜人民对于这场运动是有所抵制的。祖祖辈辈生活在曲阜，他们对“三孔”是有感情的，并且国务院的“全国重点保护单位”的石碑也让他们认识到“三孔”是国家的文物，是不能随便破坏的，破坏“三孔”就是反对国务院，他们对国务院、对周总理是心存敬畏的。同样，他们认为“三孔”是曲阜的文物，要破坏也理应由他们当地人来破坏，别人没有权利插手。

但是，北师大红卫兵来到曲阜之后，通过办报纸、发传单、建立“讨孔”联络站、办“阶级教育展览”等方式控诉“孔家店”的罪恶，号召人们起来“讨孔”，尤其是举办了一系列“阶级教育展览”后，强烈的生活反差、建国后封存的地契、合约以及国民党的“四旧”物品，引起了当地群众，尤其是贫下中农的愤恨与恐慌，他们感到生活的不公平，再与解放前的遭遇相对比，更相信了红卫兵所宣传的“孔家店是封建主义的庄

园，是万恶的四旧代表，是剥削、压迫他们的地主阶级”，正如他们的顺口溜中所唱：“地主吃的是鸡鸭鱼肉，佃户吃的是窝窝头，糊涂汤，喝不足溜；地主穿的是绫罗段，佃户穿的是破袄头、破补丁，还得露肉；地主住的是瓦屋楼，佃户住的是破矮草房，进门来下腰低头；地主娶了三房六妾，佃户不少成了绝户头……”<sup>[32]</sup>“纳上粮，饿断肠；欠租粮，押‘东房’；荒年暴月还纳粮，退地被逼卖儿郎；‘圣人’若是讲‘仁慈’，何必喝血吸髓象虎狼？”<sup>[33]</sup>在痛诉孔家店罪恶的同时，他们认为孔府里保存着国民政府的党旗、党徽等物品，尤其是孔府以前的地契、账本等，是“阶级敌人想搞复辟，想变天，想叫我们贫下中农受二茬子罪，想叫我们贫下中农人头落地”，于是，他们变恐惧为动力，从思想上转变了认识，开始积极投入到“讨孔”中去，就算“卖了老母鸡，砸锅卖铁也要支持你们干革命”<sup>[34]</sup>，成为红卫兵“讨孔”运动的坚实后盾。

而在1966年底至1967年初的扒坟狂潮中，农民的积极性之所以高涨，是因为利益的驱使。一方面，他们挖出来的财宝可以分红，另一方面，每天的劳动也是有补偿的，大队给每个人每天补贴5毛钱，或者是给两个工分，这比侍弄庄稼省事，工资还高，而且更加刺激，更有新鲜感，这些都激起了他们扒坟的热情<sup>[35]</sup>。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这场“讨孔”运动中，不管是红卫兵，还是曲阜当地干部、群众，他们都有自己的立场，但也随着形式的变化不断调试自己的立场，配合自己的行为，在这样一场自上而下发动的政治运动中，没有谁能真正控制局面，他们都是“左”倾路线的受害者。

### 三、曲阜“破四旧”运动的内容

#### 1、风风火火的改名风潮

“破四旧”运动是从改名开始的，即更改所谓“散发封建主义，资本主义霉味”的村庄名、街道名、地名、人名等等，将这些沿用了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所谓带有“封、资、修”色彩、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名称改换成带有所谓革命色彩的名称。

县委做出开展“破旧立新”运动的决议后，红卫兵们敲锣打鼓，到处张贴大字报、标语，集会演说，热情地向居民提出更改旧街道名称的革命倡议，他们要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彻底“破四旧”，让曲阜换上崭新的社会主义新装。在红卫兵的宣传鼓动下，曲阜到处充满了革命的气氛，很多街道都换上了富有革命意义的新街名。如：将“阙里街”改名为“反封街”；“更道新街”改名为“解放街”；“城隍庙街”改名为“红星街”；“三皇庙街”改名为“红卫兵街”；“官园街”改名为“工农兵街”；“西关大街”改名为“反帝大街”；“东关大街”改名为“东升大街”；“仓巷街”改名为“跃进街”；将“西门大街”和“通相圃街”合称为“反修大街”；“天官第街”与“后座街”、“颜庙街”合称为“灭资街”；“轱辘把街”与“书院街”合称为“太阳升街”；“棋盘街”与“南门大街”合称为“兴无街”；“钟楼街”与“五马祠街”合称为“红旗街”；“鼎新街”与“纸坊街”合称为“文革街”；将“浴德胡同”改名为“四清胡同”……

一些学校和村庄也行动起来，“书院街小学”改名为“太阳升小学”；“曲阜师范学院附属小学”改名为“红联小学”；“书院公社”改名为“东风公社”；陵城公社的“玄帝庙大队”改名为“红光大队”；“大庙村”改名为“向阳大庙”……

一些店铺在改名的同时，也对店面布置进行了彻底清查，把张贴、悬挂在墙上、门外的一些所谓的“庸俗腐朽”的字画、牌匾全部去掉，换上了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牌。

很多青少年也为自己更改了革命化的名字，如“向东”、“仰东”、“随东”、“立新”、“志红”、“永革”、“革新”、“红卫”等。但是，由于曲阜孔姓较多，一时间重名现象严重，造成了人际交往的混乱。总之，一时间，富有革命意义的名称响遍了整个曲阜县城。

从这些革命名称背后蕴含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出，“文革”改名风潮实质上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意识形态命名运动，这种行为在让一下子获得权利的红卫兵获得了暂时的、肤浅的满足感的同时，也暗喻着旧秩序的颠覆和新秩序的建立。但实际上，根据笔者与校场路街口几位80多岁的老人交流时了解到，尽管街道、学校、村庄等都改成了富有革命意义的新名称，但是除了青年学生、红卫兵顺应时代潮流之外，大多数曲阜当地居民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改变原有的名称习惯，因为以前的名称在他们的心中已经深深的扎了根，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习惯，不容易那么顺利改口。并且“东方红”、“东风”、“工农兵”、“跃进”等重复而单调的名称也造成了地名的混乱，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因此，“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这些当时被赋予革命意义的名称又全部改了回来。这也说明，“破四旧”运动中风风火火的改名风潮，只是红卫兵狂热冲动下的表面行为，只是在制度层面发生了影响，在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领域还没有发生根本转变，改名运动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被人们忆为一场闹剧。

## 2、取消一切庙会、拆除各种牌坊

旧时曲阜境内有多座庙宇，城区有城隍庙、三皇庙、娘娘庙、关帝庙、玄弟庙、南堂庙、火神庙、龙王庙、冷神庙、鲁班庙等十余座庙，乡间几乎各村都有大小庙宇，尤其是土地庙、家庙、门神庙最为普遍。凡到祭祀之日，居民多去烧香、上供、磕头，以求神灵保佑。有些较大的庙宇，还会定期举行庙会，热闹非凡。但是“破四旧”之风在曲阜蔓延开来不久，曲阜县委就做出决定将各村各地的大小庙宇拆除，或者是将庙宇改做它用，并取消一切庙会、香火会以及宣传尊孔复古的林门会等。

曲阜还有许多节孝坊、功德碑、烈女碑等，它们在“文革”期间都被当做“四旧”拆除，尤其是在“讨孔”运动中，红卫兵广泛宣传“孔老二是制造四大绳索束缚中国劳动人民手脚的罪魁，更是几千年来剥削阶级压迫妇女、侮辱妇女的祸首……”鼓动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妇女、五好女青年、女社员按照毛主席说的“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sup>[30]</sup>，自己动手，拉倒节孝坊，砸坏烈女碑。在此期间，曲阜县被破坏的牌坊无以计数，主要有：西门大街东首两座功名坊、一座节孝坊被毁；北门大街街北首孔传钜之妻的贞节牌坊，及坊后名曰“文津桥”的四孔石桥皆被拆除；小雪村中东西大街东段清嘉庆二十五年为武继泽继室韩氏节妇而

立的“救褒节孝”石坊被拆除；防后官庄东北岳家林内“怀远大将军岳君之祖莹记”碑被劈成两半；驻跸北村村北陈氏祖茔南面作为曲阜、邹城两县的分界地的阎王庙、戏楼，西面明威将军赵公碑被毁；小雪村内南北大街南首建于明天启年间的玉皇阁，俗称“南阁”，分上、下两层，上层南北各有横石匾一块，南曰：“南望峰峰”，北曰：“北瞻泰岱”，为清代书法家孔贞璋所书，“文革”中也被拆除。

曲阜庙宇、牌坊都是拥有悠久历史的珍贵的文化遗产，可是在“破四旧”运动中，几乎全部被毁，这是一场文化和文物的浩劫。

### 3、婚丧嫁娶等习俗的改革

#### (1) 婚姻问题上的“破旧立新”

“文化大革命”期间，曲阜县坚持突出政治、思想领先的原则，放手发动群众，开展路线分析，狠抓婚姻问题上的“破旧立新”斗争，主要表现在形式上摒弃了传统繁琐的婚礼仪式。当时青年结婚，由双方生产大队团支部批准和主持操办，使用红旗和锣鼓送迎，新娘步行至男方家，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坐着马车、驴车或者是骑着自行车。男方团支部负责人率领新郎及众人到村头迎接新娘，男女双方在路上接头之后，两人抬着毛主席像共同回到生产大队部举行结婚典礼。婚礼程序主要有：向毛主席敬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向林副主席敬礼，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向双方父母敬礼，合唱《东方红》；双方团支部代表讲话，赠送《毛主席选集》，赠送生产工具（在当时被称为“四大件”，即锄、镰、镢、锨），意味着青年们要以劳动为最光荣，鼓励他们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然后是分撒喜糖，迎送人员抽喜烟，喝喜茶，热闹一番后结束。

曲阜县婚姻问题上的“破旧立新”以董庄人民公社翟屯大队最为典型。在“节约闹革命”的口号下，翟屯大队领导干部认为“在婚姻问题上送彩礼、陪嫁妆、送红贴、喝喜酒、拜亲见友、下‘成字’，是‘妄图拉青年下水，混淆阶级阵线，腐蚀人们思想，麻痹群众斗志，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导致很多人在婚姻问题上，铺张浪费，沿用旧俗。”于是，翟屯大队党支部接连举办了两期毛泽东思想妇女学习班，把要彩礼与退彩礼、早婚与晚婚、铺张浪费与新事新办，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去认识，教育大家端正方向，为革命移风易俗。并成立了“革命妇女破旧立新造反派”，“利用天天读、地头会、谈心活动，充分发挥读报组、小评论、土广播、黑板报的作用，开展婚姻问题上的‘破旧立新’斗争。”在他们的广泛宣传下，这场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翟屯大队）七队有一个订了婚的女青年，家长和本人都不愿意退彩礼，妇代会和造反团的同志，分别和家长、本人促膝谈心，一起批判封建婚姻制度，很快解除了全家人的顾虑，退掉了彩礼。”“现在，全大队25名订了婚的妇女中，23人退了彩礼；订了婚和未订婚的75名女青年中，57人制订了晚婚计划；很多将要结婚的姑娘也提高了觉悟，说服了对方和老人，实行新事新办。”<sup>[37]</sup>

对于婚姻习俗的改革，尤其是新事新办，应该说进行的比较好。对于男方来说，新事新办减轻了家庭负担自然高兴而支持；对于女方来说，虽然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

害，但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为了表明自己支持“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也做出了让步。当然当时人们也有这样想的：人家这样办，你不这样办，觉得丢人。并且，在采访过程中，很多人发出这样的感慨：还是“文革”时期新事新办好啊，现在结婚要花太多钱了，真是劳民伤财啊<sup>[38]</sup>。这也说明“文革”时期婚姻问题上的“破旧立新”是有一定可行性和积极意义的。

## （2）丧葬礼仪与祭祖的变化

在“破四旧”运动的风潮下，传统的丧葬仪式被禁行，亲人去世一般薄棺简葬，亲友多送花圈、挽联，孝眷们带黑纱，村街（生产队）负责举行追悼会。会后，抬棺葬于祖林。以前的搭灵棚、置供案、备社火、请鼓乐等都被当做封建残余而被取消。按照传统，城乡居民多在家中设祖先牌位，亲人去世后有五期祭、百天祭、死祭（卒日）、冥祭（生日）等，清明节、“秋祭日”也普遍上坟、烧香，以示悼念。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一切传递哀思与怀念的方式全部被禁止，祖宗牌位被没收、砸坏，或者是被焚烧，香炉灯盏等也被没收，集中销毁，更不允许买卖这些封建物品。时任东风公社西林西村大队会计孔繁臣回忆说：“当时家里死了人，不让穿孝服，简单的在胳膊上戴一个青袖章，有的有孝字，有的没有孝字，这样来代替穿孝服。也不让请鼓乐、吹唢呐什么的，不叫烧香、磕头，也不让上坟，如果看见你烧香祭祖，就没收你的香、香炉、蜡台、烧纸、金银财宝等，并对你罚款，人们交不起，情节严重的就会受到批评，甚至是批斗，因此，人们也就不敢烧了。”从孔繁臣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破旧行为并不是人们自愿的，而是采取强制性手段，人们不得不执行。并且，“按照习惯，白事亲戚、朋友、街坊邻居帮忙，当家的要请客吃饭表示感谢，并且饭局座次也有严格规定，以示对长辈的尊重。但是，当时已经没有那么多的规矩，正式的宴席也被大锅菜所取代，人们随便找个地方坐下就吃，一点也不在乎尊卑长幼了。”<sup>[39]</sup>

由此可见，在礼仪之邦的传统中国社会，历来受到人们重视的丧葬习俗在“破四旧”风潮的冲击下，受到彻底的颠覆。当然在禁止烧香、磕头等封建迷信方面，是进步的一面。但是，用强制手段去限制人们通过办一个隆重的有模有样的葬礼来表示自己孝心的行为，去干涉人们传统的悼念祖先的方式，禁止人们采用任何形式寄托哀思，不能不说是一种道德的后退。

## 4、传统节日习俗的改革

春节历来是每个中国人最重视的节日，也是每个家庭亲人团圆、亲友拜访、维系家族关系、亲友关系的重要纽带。但是，“文革”期间对春节有了另样的认识，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成为一种时尚。

首先，要摆正普通民众对过一个革命化春节的认识，从思想上深入发动“公社干部、青年、妇女、民兵和贫下中农学习县委过一个革命化春节的宣传材料，揭露烧香、供祖等封建迷信的弊端，教育他们‘破旧立新’，勤俭过节，反对铺张浪费，大吃大喝，请客送礼。各公社、各单位严禁用公款请客吃饭，组织广大党员、团员、群众开展忆苦思

甜活动。”<sup>[40]</sup>

其次，过革命化的春节也要表现在实际行动上，于是，大年初一挨家挨户相互拜年变成了“团拜”，即本村村民（主要是村干部等）聚集在大队大院里，相互问好，就算拜年。走亲访友也成为一种禁忌，“更不允许跨篮子、带礼物，认为这是搞资本主义，搞腐败。春节期间，各村革命委员会主任会组织人专门去村口检查，这些党、团员积极分子和红卫兵就会‘认真’检查，对那些‘不听话’的村民没收其物品，并赶回家，严重者还要专门开大会批评，让他作检讨。不过，也有趁着天黑和中午没人的时候，把东西藏在包袱里系在腰上，偷偷的去串亲戚的。”<sup>[41]</sup>严格的制度阻挡不了人们的亲情、友情以及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但是，亲情、友情、邻里和睦等人们之间正常的相互走动受到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维系人际正常关系的社会公德和行为准则。

尽管广泛宣传禁止人们在过年时烧香、供祖等封建迷信活动，但是仍然有人“在夜间偷偷的供上香、供上财神等，一到天明趁别人看不见，赶紧把供品收起来。”<sup>[42]</sup>用他们自己的话就是“变相抵制，消极执行”。对于村干部来说，尽管他们会在宣传会上宣讲封建迷信的坏处，积极号召人们破除“四旧”，也会在突击检查时，没收偷偷上供人家的供品，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老百姓一些传统的风俗习惯沿用了这么多年，一时间很难彻底破除。并且过年过节烧香、上供、祭祖，是多少年来流传下来的习俗，既表达了家族的传承，又表达了自己对先辈的思念和孝心，被当做‘四旧’破除，自己也难以接受。”因此，对老百姓的“暗箱操作”便得过且过。并且，“在别人看来，自己已经尽力了，已经做好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了，但是干的不好，执行的不得力，是能力不行的问题，不是思想问题。只要不是思想问题，上级就没理由批评我们。”<sup>[43]</sup>

除了春节，其他节日也都带上“文化大革命”的色彩，以突出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敬仰与以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为中心。下面是曲阜县革命委员会与驻军、曲师院革命委员会对1968年国庆节庆祝活动的安排：“十月一日上午九点在灯光球场召开万人庆祝大会，会后举行游行，参加会议的所有单位要抬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带着毛主席语录牌，打着彩旗，敲锣打鼓。参加会议的人员都要携带《毛主席语录》，佩戴毛主席像章，有条件地在胸前挂毛主席画像。”<sup>[44]</sup>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节日的庆祝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的范畴，完全被赋予了“文化大革命”中对毛主席“三忠于”、“四无限”的色彩。

## 5、批判服务行业的“歪风”

扫除“封、资、修”首先是对不符合“无产阶级口味”的发型、服装、装饰、书籍等进行攻击。“凡是宣扬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我们要坚决取缔，决不能让它自由泛滥。”<sup>[45]</sup>于是，曲阜县各个学校的红卫兵到处向理发店、服装店、裁缝店、古书店等张贴大字报，批判“奇装异服”，要求妇女剪掉辫子，不许书店出售古书典籍等所谓“坏书”。

红卫兵在交通要道、机关、学校、工厂门口设立“破旧立新站”，专门检查人们的衣着发式，他们手里拿着剪刀等工具，对他们认为不合格的发式当场剪掉，人们的穿着也受到严格的限制，除了军式服、工人服、学生服之外，统一穿黄绿色或者是青色、黑色等色调单一的衣服，连衣裙与色泽鲜艳的衣服都属于“四旧”必破之列，连老人留了多年的胡子也难以幸存。在那个年代，红卫兵对看不惯的发型和服饰接来就剪的事例屡见不鲜。

红卫兵还到古书店门前宣传讲演，教育店主将“坏书”上缴或自行毁坏。虽然其中有宣传封建迷信的书籍，但更多的是好书，有经典传世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等；有唐诗宋词；有《四书》、《五经》、《论语》、《中庸》、《大学》等儒家经典；有民间说唱、科技药书；有外国名著……这些都被红卫兵列为需要破除的对象，有的被卖到废品收购站，有的被卖到印刷厂做了纸浆，有的则被焚毁。“千秋文化尘与土，万代典籍焚长巷。新‘旧’谁与细分辨，狂涛过处夜茫茫。”<sup>[46]</sup>正是清晰描述了当时焚毁旧书的景象以及人们无奈的心情。

红卫兵在服务行业的造反行为侵犯了人们的私人财产，打扰了人们的私人生活领域，限制了人们的人身自由，给人们的正常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他们对古代典籍、字画的破坏，没有评价好坏的正确标准，认为只要和“古”字沾上边的，就都是“四旧”，这对于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古代艺术瑰宝，是一次致命的打击。

## 6、文艺方面的“破旧立新”

在中共中央关于文艺方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指导下，中共山东省委二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也对此作了重要指示：“认真清理戏剧、电影和各种文学艺术作品，优秀的继续演出、放映和翻印发行；内容好但有缺点的，重新修改加工；内容不好无修改价值的作废；内容反动的，公开进行批判。”<sup>[47]</sup>

中共曲阜县委学习了这次会议精神之后，在文艺界展开“破旧立新”活动。在戏剧方面，批判戏剧中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牛鬼蛇神”等所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旧文化。全县开始禁演古装传统戏剧，着重放映江青以“三突出”原则培育的八部革命样板戏（包括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同时把样板戏的放映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认为：“革命样板戏是无产阶级同机会主义斗争的锐利武器，普及革命样板戏是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进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需要，是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需要……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使工农兵劳动人民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里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sup>[48]</sup>农村业余剧团除排演八部样板戏外，还演出《血泪仇》、《红嫂》、《沂河两岸》等革命戏剧。在电影放映方面，《追鱼》、《红楼梦》、《林家铺子》、《红日》、《抓壮丁》、《不夜城》等一些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毒草的电影都被禁放，同时组织县委各领导干部集体观看毒草电影，对此进行批判。在农村，电影的放映要经

过严格审查，主要放映一些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批判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影片，如《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等。并且在影片放映之前，要求“组织各单位的群众和电影队利用广播、黑板报、宣传栏等工具，报道映出影片消息，并在街上张贴大字标语、海报、彩照、宣传画等。影片放映之时，组织县直机关干部、革命师生、革命群众列队欢迎，并举行有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上映仪式由县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出面讲话，以表达我们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各区、社也要仿照这种做法，组织群众进行欢迎。看片时要隆重严肃，在不影响‘抓革命、促生产’的原则下，各单位都要组织群众敲锣打鼓，打着彩旗，唱着毛主席语录歌，抬着毛主席像、语录牌等，要做到有组织、有领导地进入放映场地。看完后，各单位要组织群众进行一次座谈讨论，有条件的写观后感、心得体会等文章。放映人员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真正认识到放映好这部影片是一项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成就的政治任务，搞好影片的放映工作。”<sup>[49]</sup>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影片放映已经不是单纯的欣赏和娱乐，而是变成了一种形式。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由上级有意安排的制度来推行，这就不能正确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单调的放映这些影片不仅不能娱乐人们的日常生活，反而在意识形态领域限制和控制了人们的思维。

## 7、批斗和抄家

乱批斗、乱抄家之风是红卫兵为了将“破四旧”之风引向深入而掀起的。它一开始就是疾风暴雨式的。抄家一开始只是没收古书、古字画等，但是随着形式的发展，抄家愈演愈烈。抄家活动并不报任何部门批准，红卫兵想抄谁的家，一涌而进，翻箱倒柜，见到金银首饰、书籍文稿一概当作“封、资、修”的“四旧”加以没收。抄家活动演化到后来，逐渐变成了“挖黑材料”、搜查“罪证”的手段。

批斗给人们带来的伤害更大。揪斗人不仅具有随意性，而且对被揪斗者进行丑化和侮辱。开始是戴高帽子，挂牌游街示众，后来发展到以强力使被揪斗者低头弯腰，掀起双臂使其成“喷气式”，直至拳打脚踢。被揪斗者既包括“地、富、反、坏、右”等一切“牛鬼蛇神”，也包括县委领导、知识分子、村干部等。从“文革”开始到年底仅仅半年时间，曲阜师范学院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教师和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干部多达十余人，占教职工总数的 1/5，这些教师和干部除了经常被揪斗之外，还被逐出家门，赶进所谓“牛棚”，并长期集中到校农场被监督“劳改”，他们的工资被扣发，活动受限制，不仅本人受冲击，而且殃及家属、子女，使教师队伍受到严重冲击<sup>[50]</sup>。“文革”期间最严重的是对曲阜城南东郭家村党支部书记郭守明的批斗。郭守明是山东省劳模、全国人大代表，1966年冬，谭厚兰来到曲阜后要求他支持“讨孔”运动，遭到抵制和反对，于是，谭厚兰便发动外地来曲阜的红卫兵和村中部分群众成立了“讨郭指挥部”，造郭守明的反，对其进行批斗，最终导致其残疾。

批斗给受害人造成的不仅是身体上的伤害，更严重的是让他们遭受心灵上的摧残。

批斗和抄家之风，毫无章法可言，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

## 8、其他

### (1) 取缔一切“牛鬼蛇神”

曲阜县对神汉、神婆、相面的、算卦的以及看风水的进行检查，坚决取缔。农村的集市贸易也被宣布为资本主义而受到限制，禁止人们赶集。农村中一直存在的认把兄弟、拜姊妹、认干娘等也被当做封建社会的做法而被禁止。

更有意思的是，在曲阜城北 50 里的石门山有两棵被当地人称为“红叶树”的奇树，它具有预测预报冰雹的特异功能。如果红叶树有哪一个大枝杈不萌芽而成为干棒时，不发芽的干枝所指示的方向，就预示着这个方向年内将有一场冰雹，干枝越多，灾情越重，干枝面积越大，冰雹的面积也就越广，当冰雹下过之后，3 天至 7 天之内，干枝就会在一夜之间起死回生，萌发出密密麻麻的新叶芽来。因此，人们都把这红叶树当做“神树”，每年的谷雨节后至麦收前的这段时间，农家百姓就会上山观看，以便对本地是否下冰雹之灾心中有数，以便安排农作物的种植。但 1966 年，“革命造反派”将“革命”的矛头指向了红叶树这对“牛鬼蛇神”，一夜之间，这对神树被铲除殆尽<sup>[51]</sup>。

### (2) 对宗教的冲击

曲阜境内少数民族以回族居多，他们都信仰伊斯兰教，并有本教标志性建筑清真寺，为传播宗教知识、进行宗教活动的中心，常年有阿訇负责主持宗教活动和民俗事务。“破四旧”运动开始后，红卫兵冲进寺中，将寺内石碑、匾额及部分房屋毁坏，阿訇也被赶出清真寺。

曲阜当地也有信仰基督教的民众，他们同样有自己的活动场所——教堂，“文革”期间，停止一切教会活动，将教堂查封，或改做它用，有的被生产队用作保管室，有的被用作红卫兵的活动场所，有的直接采取“砍掉大树乌鸦不叫”、“拆掉庙子小鬼不闹”的做法，被彻底破坏。

“文革”中对于宗教活动、群众宗教信仰的干涉，违背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一贯坚持的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的方针和政策，伤害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感情，给我国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综上所述，“文革”初期的“破四旧”运动以“讨孔”最为典型，对“三孔”及其文物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而风风火火的改名风潮，对婚丧嫁娶等旧风俗、旧习惯的改革，对服务行业的冲击，对文艺方面、宗教的冲击，批斗和抄家等各方面“破四旧”运动的内容，也给人们的正常社会生活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但“破四旧”运动只是“文化大革命”的序曲，随着“四人帮”夺权斗争的加剧，随着一浪高过一浪的群众运动的开展，被中央文革小组利用的“破四旧”运动也渐渐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破四旧”运动慢慢的淡出人们的视野，退出了历史舞台。

## 四、曲阜“破四旧”运动的影响及评价

“文革”初期的“破四旧”运动在轰轰烈烈开展之后，留下的是对曲阜社会各个层面的负面影响。“讨孔”运动中文物破坏无以计数；各大中学校学生纷纷停课闹革命，批判学校教育制度，冲击教师队伍，阻碍曲阜教育事业的发展；工人、农民等因为被运动搞得晕头转向，挫伤了生产积极性，对曲阜经济造成一定影响；同时，各种各样的“破四旧”的内容，也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通过这层层面面，我们可以看出，“破四旧”运动并没有实现破“旧”立“新”，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反而造成了社会的动荡和历史的倒退，这些都使得我们深思。

## 1、影响

### (1) 对文物的破坏

在“破四旧”运动中，破坏性最大、影响最为恶劣的就是对文物的破坏，孔府里的各类档案、瓷器、字画、古书典籍，孔林中的历代石碑等都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也是我们研究历史、了解历史的宝贵材料。但是在“破四旧”运动中他们都被当做“四旧”无情的破坏了。不说屋檐上被打掉的叭叭狗、龙、鸟、狮、鸡等装饰物，不说各家各户被没收、被烧毁的古书典籍，不说被拉倒的各式各样的牌坊，不说孔庙里被砸成几块的巨型石碑，不说孔府门前被推倒的石狮子，仅是据统计的在“讨孔”运动中破坏的文物数量就足以让我们触目惊心。

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谭厚兰在曲阜掀起的“讨孔”运动中，毁坏的文物即达6000余件，破坏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砸烂历代石碑1000余座，被毁的文物中有国家一级保护文物70余件，珍版古籍1700余册<sup>[52]</sup>。后来在孔府举办的反动实物展览中，破坏的文物比谭厚兰时更严重的多，这些文物被堆放在孔府大成殿和东西庑里，由于无人看管致使很多文物丢失，由于房屋的潮湿致使大批文物受潮而损坏。总之，在这场运动中被破坏的文物无以计数，也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从道理上来讲，破“旧”立“新”是文明的正常新陈代谢，这本也无可厚非，但在运动开展过程中却乱了章法，不论真的“四旧”还是假的“四旧”都被破掉，红卫兵一阵盲目的打砸烧抢，致使“文化大革命”变成了“大革文化命”。

### (2) 对曲阜教育事业的阻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县各大、中、小学纷纷停课“闹革命”，建立红卫兵组织，开展“破四旧”运动，学校很快陷入无政府状态，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浪潮中，各校各级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打倒，党的各级组织受到冲击，无法实施对学校的领导，学校处于极度动荡和混乱之中。“革命委员会”在此期之间充当了维护派别利益的工具，置党的政策于不顾，迫害干部，压制群众，使广大知识分子的身心健康、思想感情和工作积极性均受到极大伤害。一些教师被诬为“臭老九”而被打成“黑帮”，有的则受到批斗，仅曲阜师范学院在“文革”开始后半年被打倒的教师就占全部教职工的五分之一，“师道尊严”扫地，教师队伍受到严重的冲击。各校学生到处张贴大字报，

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认为学校“用资产阶级智育第一反对无产阶级政治第一”，批判课程、教材、教学内容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体系”<sup>[53]</sup>。他们忙于运动，四处串联，根本无心学习。

即使在1967年中共中央“复课闹革命”的批示下，大、中、小学生陆续回校复课，复课的要求是“复阶级斗争之课，复毛泽东思想之课，复文化大革命之课”，把“革命”放在首位。小学生主要学习《毛主席语录》，《十六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老三篇》，学唱革命歌曲；中学生学习毛主席著作，批判旧教材和教学制度；大专院校放弃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课，也统以《毛主席语录》或其相关著作作为主要教材。由此可见，复课并不是复业务课，复课的首要任务是“闹革命”。并且，由于不少学校因为闹派性，打派仗，长时间没有真正复课，或者是短期复课后又停课，导致教学秩序仍然混乱。

曲师院教学科研被取消，人才培养被迫中断，自“文革”开始的1966年至1970年，曲师院和全国其他高校一样，连续五年未能招生。学校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和流失。

总之，“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直接阻滞了曲阜县教育事业的发展，给曲阜县教育事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 （3）对曲阜经济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各机关、厂矿、公社、村大队等单位相继建立了红卫兵组织，开展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尤其是在红卫兵的广泛宣传下，广大贫下中农被发动起来参加“讨孔”运动，虽然在运动中中共曲阜县委多次召开会议强调民以食为天，要集中精力抓好生产，也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但是，革命是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造成“天下大乱”，于是，在社会动乱的同时，也乱了生产。工厂、企业“停工、停产闹革命”，村干部受到批斗，农民也被各种名目繁多的大会、小会、批斗会搞得晕头转向，这些都严重挫伤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扰乱了正常的生产秩序，致使社会生产大幅度下降，各项经济指标严重下滑。仅1967年来说，全县工业总产值1278万元，比1966年下降约18%；农业总产值12694.2万元，比1966年下降约19%；粮食总产量12234.2万公斤，比1966年下降约12%；平均亩产206公斤，比1966年下降约11%；财政收入359万元，比1966年下降约15%<sup>[54]</sup>。

这场群众运动违背了生产的客观规律，严重挫伤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在以往“抓这抓那，抓不住生产白搭”的农村社会，现在已经被各种需要农民去参加去“捧场”的大会小会充斥，并且参加会议还会给工分，在去开会与参加劳动获得同等价值的前提下，在集体经济的前提下，人们都选择去开会，而不是去参加体力劳动，开会时间占用了人们大量的劳动时间。另外，各级领导干部在运动中被打倒，一些未打倒的干部不是不关心生产只关心运动，就是出于惧怕心理不敢放手发动生产。由此可以想象这场运动给曲阜经济带来多么严重的损失。

#### (4) 对人们正常生活的干扰

虽然说“破四旧”运动的主要内容是破除旧的风俗习惯和思想文化，但是运动的执行者都是人，在运动的执行过程中就不可避免的给人们的正常生活造成冲击，带来麻烦。

运动期间，红卫兵采取的抄家、没收“四旧”之物，对领导、知识分子、以及地、富、反、坏、右分子采取的挂黑牌、戴高帽、游街、白天黑夜批斗、大会、小会揪斗，甚至进行拳打脚踢、喷气式等各种形式的迫害，不仅触及他们的财产，他们的皮肉，还触及他们的灵魂，而且有时还牵连其子女和家属，使其在惶恐不安中度日如年。这些行为都严重践踏了社会主义法制，破坏了社会主义正常的民主秩序。

“破四旧”运动中的形式主义也让人哭笑不得，有时甚至起了反作用。如杨家村人万邦×，因其端着碗在门口蹲着吃饭被认为是不文雅、不卫生，受到群众的批判、批斗，影响了他的正常生活，使他的心灵受到沉重打击，以致后来导致其成为造反派，走向了极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和生活自由，可是“破四旧”运动中的形式主义对个人生活方式的干扰，引起人们心理上的反感，并致使其走向极端，使“破四旧”运动更加得不偿失。

## 2、评价

通过“破四旧”运动的内容和影响我们可以看出，“文革”初期的这场运动是一场荒谬的政治运动，它没有像提出的“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一样，真正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反而使正确与错误、合法与非法、文明与野蛮、高尚与卑劣、真善美与假恶丑完全被颠倒了，造成了社会的动荡和历史的倒退。

首先，“破四旧”运动本身是为“文化大革命”服务的，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认识，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导致了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与“中央一线”发生分歧，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着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于是他希望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手段，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实现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但是，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并没有被广大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所认可，“文化大革命”也没有像毛泽东想象的那样开展起来。恰在此时，毛泽东发现了红卫兵，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接见了红卫兵，并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预示着红卫兵将正式走上政治舞台，从“破四旧”运动开始的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成为毛泽东实现“天下大乱”、自下而上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手段。

由此可见，红卫兵的造反行为实际上是由中央上层支持和鼓励的，是出于发动群众的需要，支持“破四旧”，可以使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得到发扬，可以使社会震惊，可以使“天下大乱”，这样，“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发动起来。所以，从根本上讲，“破四旧”这个口号是为发动“文化大革命”铺路的，这一理论的错误也注定了“破四旧”

运动的错误。

其次，红卫兵发动的“破四旧”运动是被林彪、江青一伙利用的。他们利用红卫兵对毛主席的单纯的热爱和感情，推波助澜，把红卫兵推向冲杀第一线，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寄希望于通过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使天下大乱，从而为其夺权提供条件，为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铺路，尤其是他们鼓励造反，对批斗、抄家给予幕后支持，甚至装作视而不见，导致这场通过破“旧”实现立“新”的政治运动走向了反面和极端。

谭厚兰一伙来到曲阜“讨孔”，就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指示下进行的。因为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他们的“讨孔”运动变得正当有理由，他们的所有破坏行动都在破“旧”的口号下变得正常、正当，顺其自然，他们不认为自己在破坏文物，反而认为这是为使社会主义变得更加纯洁，反对封建主义是他们的任务，打倒“孔家店”是他们的责任，他们的狂热冲动导致了他们的盲目，他们的理直气壮造成了文物的巨大破坏。

再次，对于“四旧”的含义并不清楚，混淆了是非。从字面上看，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一定的社会进步性，但是，当时只是满足于提提口号，究竟什么是“四旧”，新旧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楚。因此，许多本来不属于“四旧”的东西都被当做“四旧”破了：一些珍贵文物、历史古迹、文化遗产、文化典籍等都被列为“旧文化”遭到破坏，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很多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象尊敬师长、邻里和睦等都荡然无存；人们传统的风俗习惯以及日常行为习惯也受到严格的限制……“破四旧”的结果，是导致了人们的思想混乱，加剧了社会动荡，以及良好社会风气的败坏。

并且，“四旧”是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它不仅仅表现在物质文化层面，也存在于精神文化层面，绝不是“革命造反”所能够破的了， “破四旧”也远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就正确的指出：“破‘四旧’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到的，是个长期斗争过程”，“不能太急”<sup>[65]</sup>。但是红卫兵被一时获得的权利冲昏了头脑，从而被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或间接利用，使这场运动成为疾风暴雨似的破坏运动。

另外，红卫兵对文化改造的表层理解，对传统文化的肆意损害，使“破四旧”运动出现了偏差。他们凭着一股“革命”冲劲，凭着一知半解便一哄而起，自以为是在捍卫无产阶级文化，不问青红皂白的砸毁大量中华古代文物古迹、焚烧珍品名画、书籍、古玩、服饰……在他们看来，旧文化既然产生在封建时代，那么，不管它本身有没有阶级性，有没有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都是必须予以“革命”的对象。最后的结果是，这场运动砸碎的不仅仅是古代的文物、遗址，而是践踏了中国悠久的物质积淀，禁止的也不仅仅是时髦的服饰、装扮，而是毁灭了人类共有的文化精神。

最后，“破四旧”采取的方法也是错误的。红卫兵在“破四旧”运动中的疯狂行为没有经过任何法律手段，没有经过任何相关部门的批示，他们采取的行为几乎完全是强

制性的，而且，在“破四旧”的名义下，破坏文物、随意抄家、拆除历史古迹、大搞体罚、侮辱人格、禁止人们走亲访友、各类打砸抢事件以及破坏道德风尚的行为举不胜举。有形的“四旧”可以采用暴力手段破除，但是，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等无形的“四旧”是不能靠暴力、靠行政手段、靠抄家和焚毁文物一下子打碎的。因此，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根本不可能实现他们迅速破除“四旧”的目的，反而破坏了我们党辛辛苦苦多年建立起来的良好的道德风尚，破坏了我们党的民主和法制建设，毁坏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

## 结语

综上，本文以曲阜为视角，通过对“破四旧”运动的背景、过程、内容、影响等方面对这场运动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使我们更深刻的认识到，“文革”初期的这场群众运动是“左”倾错误思潮的产物，是一场严重的政治灾难。

从微观角度研究这场运动，能让我们更深刻的了解这场运动。首先，风风火火的改名潮、取消一切庙会、拆除各种牌坊、对婚丧嫁娶等各种传统的风俗习惯进行改革、对服务行业和文艺界、宗教的冲击、甚至是乱批斗、抄家等行为都使得曲阜的“破四旧”运动具有全国“破四旧”运动的共同色彩。其次，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和纵容下，以谭厚兰为首的北师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的红卫兵来曲阜开展了“讨孔”运动，这使曲阜的“破四旧”运动又拥有自己的特色内容。

从本质上讲，“文革”初期的“破四旧”运动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实现“破旧立新”，推动社会的改革和进步，相反，一阵打砸抢给我们带来的是对中国悠久物质积淀的毁灭，是对人类共有文化精神的践踏，是对传统良好道德风尚的否定，是对人们正常社会生活的冲击，这决定了“破四旧”运动只能是一场严重的政治灾难。“左”倾错误思潮的影响、别有用心之辈的怂恿、红卫兵政治上的不成熟导致的盲目和冲动、人们对“四旧”的含义认识不清楚等都是“破四旧”运动之所以失败的原因。

“四旧”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它不仅仅表现在物质文化层面，也存在于精神文化层面，有形的“四旧”可以采取暴力手段破除，无形的“四旧”是不能靠暴力、靠行政手段、靠批斗和抄家所能够打碎的。通过田野调查得到的结果也证实，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根本没有实现他们迅速破除“四旧”的目的，这种极端的行为违背了人们正常的生活习惯和意愿，最终只能引起人们的反感，在实际操作中也往往敷衍了事。另外，很多风俗习惯在“文革”结束后又重新被提起，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破四旧”运动的失败。

历史反思是民族进步的阶梯，通过对曲阜“破四旧”运动的深入分析和研究，以史为鉴，从这段痛苦的经历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使我们党和国家在以后的政治生活中不再重蹈覆辙，才是笔者撰写本文的目的所在。

## 参考文献:

- [1] 曲阜市档案馆藏. 中共山东省委二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全宗号: 001-02-0026-01.
- [2] 曲阜市档案馆藏. 中共曲阜县委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全宗号: 001-02-0262-02.
- [3] 王志明、张北根.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内乱骤起(1965--1969)[M]. 红旗出版社, 1994. 24.
- [4] 李松晨、唐合俭、杜述胜. 文革档案[M].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9. 128.
- [5] 陈伯达.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N]. 人民日报, 1966-06-01. (1).
- [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N]. 人民日报, 1966-08-09. (1).
- [7] 王志明、张北根.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内乱骤起(1965--1969)[M]. 红旗出版社, 1994. 27.
- [8] 人民日报社论. 好得很[N]. 人民日报, 1966-08-23. (1).
- [9] 中共曲阜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曲阜市历史大事[M]. 1996. 312.
- [10] 曲阜市档案馆藏. 曲阜县第一届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全宗号: 095-04-0001-01.
- [11] 访谈骆承烈, 时间于2009年4月11日. 骆承烈, 男, 现年75岁, 时任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
- [12] 中共曲阜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曲阜市历史大事[M]. 1996. 316.
- [13] 访谈王良, 时间于2009年5月9日. 王良, 男, 现年52岁, 时为小学生.
- [14] 访谈吴建喜, 时间于2008年10月35日. 吴建喜, 男, 现年70岁, 时任曲阜县夏家村东风公社团支部书记、管委会主任.
- [15] 访谈孔××, 时间于2009年2月17日. 孔××, 男, 现年75岁, 时任曲阜县委常委.
- [16] 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 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排除万难 去争取胜利——井冈山红卫兵战士满怀革命豪情在天安门宣誓[N]. 讨孔战报, 1966-11-10. (4).
- [17] 访谈孔祥全, 时间于2008年11月1日. 孔祥全, 男, 现年69岁, 时为曲阜县委报道组成员.
- [18] 北师大井冈山《讨孔战报》编辑部. 捣毁孔家店 彻底闹革命 为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战[N]. 讨孔战报, 1966-11-10. (2).
- [19] 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 捣毁孔家店[N]. 讨孔战报, 1966-11-10. (4).

- [20] 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 火烧孔家店-----讨孔宣言[N]. 讨孔战报, 1966-11-10. (3).
- [21] 北师大井冈山《讨孔战报》编辑部. 诸葛亮会——曲阜地区贫下中农讨孔座谈会纪要[N]. 讨孔战报, 1967-2-26. (4).
- [22] 何立波. 荒诞的破“四旧”[J]. 党史天地. 2006, (2): 48.
- [23] 北师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 就“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孔府、孔庙、孔林”一事给国务院一封抗议信[N]. 讨孔战报, 1966-11-14. (2、3).
- [24] 北师大井冈山《讨孔战报》编辑部.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捣毁孔家店, 彻底闹革命[N]. 讨孔战报, 1966-11-20. (2).
- [25] 《红色造反报》记者. 彻底捣毁孔家店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坚决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N]. 红色造反报, 1966-12-8. (4).
- [26] 陈庄公社岳家林大队贫下中农代表. 彻底换脑筋[N]. 讨孔战报, 1966-12-12. (10).
- [27] 访谈孔繁臣, 时间于2008年12月16日. 孔繁臣, 男, 现年69岁, 时任曲阜县东风公社西林西村会计.
- [28] 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 敬电毛主席[N]. 讨孔战报, 1966-11-30. (1).
- [29] 曲阜师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讨孔战士. 铲平孔坟, 解放孔林[N]. 讨孔战报, 1966-11-30. (9).
- [30] 中共山东省党史研究室. 中共山东八十年简史[M].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1. 185.
- [31] 北师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 告全国革命人民书[N]. 讨孔战报, 1966-11-10. (3).
- [32] 陈庄公社岳家林大队贫下中农代表. 控诉“孔府”的罪恶[N]. 讨孔战报, 1966-11-30. (7).
- [33] 曲阜县房山区齐王坡公社王家村大队贫农社员. 交租三剥皮, 骨髓被吸干[N]. 讨孔战报, 1966-12-12. (6).
- [34] 北师大井冈山《讨孔战报》编辑部. 诸葛亮会——曲阜地区贫下中农讨孔座谈会纪要[N]. 讨孔战报, 1967-2-26. (4).
- [35] 访谈孔祥全夫人, 时间于2008年11月1日. 孔祥全夫人, 女, 现年68岁, 时为曲阜县东郭公社社员.
- [36] 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中文系支队. 妇女思想的大解放[N]. 讨孔战报, 1966-11-25. (2).
- [37] 曲阜市档案馆藏. 把婚姻问题上的破旧立新斗争进行到底<翟屯大队党支部革委>. 全宗号: 093-01-0152-001.
- [38] 访谈孔宪襄, 时间于2009年1月3日. 孔宪襄, 男, 现年74岁, 时任曲阜县小雪公社北雪村副书记.
- [39] 访谈徐福庆, 时间于2009年1月3日. 徐福庆, 男, 现年80岁, 时任曲阜县小

雪公社西鲁村支部书记。

- [40] 曲阜市档案馆藏. 革命化春节. 全宗号 095-01-0068-028.
- [41] 访谈孔祥全夫人, 时间于 2008 年 11 月 1 日. 孔祥全夫人, 女, 现年 68 岁, 时为曲阜县东郭公社社员.
- [42] 曲阜市档案馆藏. 中共城关镇委员会关于发动群众欢度革命化春节的情况报告. 全宗号: 029-01-0066-013.
- [43] 访谈孔宪襄, 时间于 2009 年 1 月 3 日. 孔宪襄, 男, 现年 74 岁, 时任曲阜县小雪公社北雪村副书记.
- [44] 曲阜市档案馆藏. 曲阜县革命委员会关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的通知. 全宗号: 014-02-0039-164.
- [45] 姜沛、李金铮. 老新闻——共和国往事(1966—1968) [M].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 80.
- [46] 陈明方. 呼出的气息[M].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6. 169.
- [47] 曲阜市档案馆藏. 中共山东省委二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全宗号: 001-02-0026-01.
- [48] 曲阜市档案馆藏. 陈基农副局长在全省电影发行放映工作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全宗号: 074-02-0002-007.
- [49] 曲阜市档案馆藏. 曲阜县革命委员会关于放映好<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影片的意见. 全宗号: 004-01-0092-024.
- [50] 曲阜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 曲阜师范大学校史(1955—1995) [M]. 90.
- [51] 宋思刚、孔德胜、宋震. 孔子故里奇人奇物奇闻[M]. 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7. 90—92.
- [52] 朱育和、张勇、高敦复.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情态录[M].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7. 385.
- [53] 《山东教育四十年》编辑委员会. 山东教育四十年[M].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9. 240.
- [54] 中共曲阜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曲阜地方史第二卷[M].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 395.
- [55] 王年一. 大动乱的年代[M].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68.

## 在校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1、《责任与问题——近现代留学生与中国的乡村建设》一文发表在《齐齐哈尔师专学报》2009年第5期

## 致 谢

时光匆匆，三年研究生求学生活，弹指一挥间。作为自己劳动的结晶，这篇毕业论文终于得以付梓，我由衷的感到高兴。

在此，首先要感谢我的恩师李先明副教授，我的毕业论文从选题、选材、资料的搜集整理到审阅、修改、最后定稿，无不凝结着老师的心血和汗水。在此，特向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由衷的敬意。

我还要感谢学院的李建老师、刘雪飞老师、孔繁岭老师、袁素莲老师、姜修宪老师，他们在生活和学习上给予了我很多关心和帮助，让我倍受感动。以及学院的张松智老师、吕厚轩老师，他们在论文开题时给我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使我在以后的论文写作中受益匪浅。正是每位老师的谆谆教诲，促使我不断进步。

同时感谢曲阜市档案馆的各位老师，他们为我查阅档案提供了方便，还要感谢我采访过的每位老人，他们为我论文的写作提供了珍贵的口述史料，这些都使我的论文得以顺利完成。

我还要感谢我的同门王智东师哥、田惠敏师姐以及董业勛师弟，他们学习和生活中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关怀，在此向他们表示我诚挚的感谢。

最后，特别感谢我的父母，他们的养育之恩，无以回报，他们的支持是我不断前行的动力。

另外，对于给予我关心和帮助的小伙伴们，在此也一并感谢。

冯娜

2010年3月